

玉輪軒古典文學論集

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

王季思著

中华书局

1982年·北京

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

王季思 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3 毫米 1/32·11 印张·257 千字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册

统一书号: 10018·500 定价: 1.25 元

目 录

苏轼试论·····	1
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	21
五代两宋词的评价问题·····	29
怎样评价柳永的词·····	35
漫谈李清照的词·····	43
有没有这样的线索和标准·····	50
传说中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	66
从《胡笳十八拍》谈到话剧《蔡文姬》·····	72
有关中国文学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	78
从“暗与理合”谈起·····	82
从夏禹治水谈起·····	87
词的欣赏·····	92
知今与知古·····	105
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	111
中国古典诗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征·····	142
如何评价李白·····	153
再说比兴·····	174
《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校证》读后记·····	181
与罗忼烈教授论元曲书·····	186
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	204
《元散曲选》前言(与洪柏昭同志合作)·····	209

不要以误传误·····	233
《东门行》的校点和评价问题——答萧涤非先生·····	241
百家争鸣和先秦诸子的文学成就·····	246
黄巾起义冲击下的建安诗坛·····	259
金元散曲的兴起和衰亡·····	272
附录	
词的正变·····	287
中国笔记小说略述·····	295
说比兴·····	307
语录与笔记·····	318
词曲异同的分析·····	325
打诨、参禅与江西诗派·····	334
后记	

苏轼试论

一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他的诗歌、散文里所表现的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①，说明了我国民族文化基础的深厚，并标志着孕育他的北宋时期社会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苏轼（1036—1101年），四川眉山人。他父亲苏洵（1009—1066年），是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在政治见解与散文写作上曾给苏轼以巨大的影响。母亲程氏是有文化修养的妇女，在苏轼少年时，她亲自教他读书，并以东汉时范滂反对宦官专权至死不屈的事迹，鼓励他长大之后为国家的正义事业而斗争。

北宋从太祖开国到仁宗晚年，经过将近百年的比较稳定局面，社会文化普遍高涨。苏轼在这种社会影响与家庭教育的优越条件之下，经过他自己少年时期的艰苦学习，在他二十岁左右时已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纵横无不如意的文章表达能力。当时首都汴京，以欧阳修、梅尧臣为中心，结集了许多学者、诗人，形成了瑰丽的文艺星座。可是当这位二十岁的苏轼和他弟弟苏辙在全国文化中心出现时，立即以他们新异的光辉，引起不少知名人士的注目。

苏辙比苏轼小两岁，从小跟苏轼共同学习。1057年，苏轼和

^① 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都有卓绝的成就。

他弟弟同在欧阳修主持礼部试时考取进士。当时欧阳修对于他的称许和期望，成为鼓舞他终身从事文艺活动的力量。

苏轼从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中间除在二十六岁考中制科在凤翔任四年地方官后一度回京外，先后因他母亲、父亲亡故，在蜀居丧，直到他三十三岁时才重到汴京任官。这时王安石已经在宋神宗支持之下开始变法了。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局势之下，赵宋王朝为了防止执政大臣的专权，有意发挥谏官的作用，加以牵制。谏官因言事得罪，虽暂时贬谪，往往不久又得提升。苏轼应考的制科号称直言极谏科，在议论上常要有意跟执政大臣处在对立的地位，而其最后目的仍在更好地巩固北宋王朝的政权。这种作风，苏轼自称为“制科人习气”^①，实际上表现他在政治上的一贯态度。他认为国家有兴必有亡，象人有生必有死一样；然而人对于生命总尽可能求它的长生，对于国家总尽可能求它的长存^②。它的具体作法是“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③；“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④。他认为如果朝廷以为可行的事，下面不问是非地赞成它；朝廷以为不可行的事，下面不问曲直地反对它，那是“以水济水”，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政治上一方面采取比较持平的态度，没有走向新、旧两党的极端；一方面仅仅提出一些补偏救弊的意见，而反对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变。当宋仁宗末年，政治上偏向因循偷惰，他所进策论大都劝仁宗励精图治，果断力行，甚至以为“居今之世，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⑤；而当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又上书神宗，主张“结人心，厚风俗”^⑥，反对王安石的新政。

① 见苏轼《答李端叔书》。

② 见苏轼《墨妙亭记》。

③ 见苏轼《辨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

④ 见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⑤ 见苏轼《策略三》。

⑥ 见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1071年，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接连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处作地方官。1079年，苏轼在湖州任官，因作诗讽刺朝廷，被捕下狱，出狱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他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辟地耕种，自号东坡居士。黄州是长江中游形势险要的地方，武汉三镇即在它的西面，我国历史上不少英雄人物曾经在这里展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斗争。苏轼谪居时所住的临皋亭，就在长江的北岸，每当夜深人静，隐隐听到江上的涛声。在祖国壮丽的江山和历史英雄人物的激发之下，他在这时期写下了极其动人的作品，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等。

1085年，宋神宗逝世，哲宗继承皇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起用司马光、范纯仁等旧党。苏轼也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反对，但对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办法，却表示赞同。这时旧党执政，要废罢一切新法，他又“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反对执政大臣“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的作法^①。并因此不安于位，自请出任外官。北宋从哲宗元祐（1086—1094年）以后，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党得势，对敌党攻击报复不留余地。因此苏轼在当时比较开朗、持平的政治态度，容易得到人们的好感。刘安世《元城语录》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这是比较能够说明他的一贯的政治态度的。

他历任州郡官，在防止灾荒、兴修水利、整饬军纪等各方面做了不少对人民有利的措施。在他离开这些地方之后，人民还深深地怀念他。

① 参看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

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死了，哲宗亲政，再度起用新党。第二年，苏轼以被诬为“讽斥先朝”^①，贬官惠州。在惠州四年，又迁到海南的昌化。昌化在当时是比较荒凉落后的地区，隋唐以来，中原人士谪官到此，每忧思憔悴，不望生还。苏轼在昌化四年，以食芋饮水著书为乐；有时背负大瓢，在田亩间高唱他的〔哨遍〕长词，以爽朗的笑声回答新党对于他的迫害。1100年，哲宗死了，徽宗即位，苏轼因大赦内徙，第二年七月卒于常州。

我国封建时代士大夫，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一般都希望出而用世；但当他在政治上遇到挫折时，原来就潜伏着的老庄思想或佛家思想，又往往把他们引向消极、甚至颓废的道路。苏轼平生倾慕贾谊、陆贽，他在政治上的主导思想属于儒家范畴。但他幼年时曾从眉山道士张易简学习，少年时就深深爱好庄子的文章。谪官黄州以后，他又经常到城南安国寺焚香默坐，归诚佛教。他在生活上表现的自适其适的洒脱态度和不以忧患生死置胸中的旷达襟怀，又显然是受了庄子与佛家的思想影响。他在谪官黄州和被安置在海南时，政治热情的消退是在诗文里表现出来的。然而由于宋代士大夫得罪降谪，往往又即起用；他生活在北宋承平时期，本身的政治态度与文学成就又受到比较多的人的欢迎。因此即使在他政治上受到严重挫折时，庄子、佛家的思想影响，也没有把他引向颓废、幻灭，而依然能以“齐宠辱、忘得失”、“超然物外”的态度，保持他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②。同时以空旷的胸怀，鄙夷不屑的态度，对待政敌所加于他的迫害。苏辙说他谪居海南时“日啖薯芋而华堂

① 先朝指神宗皇帝。

② 苏轼在神宗时上书议学校贡举说：“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一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象庄子那样的生活态度对王朝政权不利，他是知道的。然而当王朝政权掌握在他的敌党手里，要利用人主的名器爵禄迫他屈服时，他就正好用这种生活态度跟它对抗，使它不发生作用，这又比较明显地在他晚年诗文里表现出来的。

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又说他当时写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这是他跟前代许多得罪贬谪的士大夫如韩愈、柳宗元等表现不同的地方。

二

苏轼是有意在文学事业上继承欧阳修的人物^①，由于他的长期辛勤创作和对于后辈学者的培养，一个新的文人政治集团在他的周围形成。这个集团在当时政治上没有象他们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等在庆历前后起的作用大，然而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却是更其广泛而深远的。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苏轼在政治上有他一贯的主张，然而他没有过分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与政治作用，而喜欢比文章作“精金美玉”，“金玉珠贝”^②，这比之初期从事古文运动的学者，要求以文章为“载道之具”，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③，见出他是更其注意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的。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就某一方面的材料去钻研。如第一次只从古今兴亡治乱方面去看，第二次只从典章文物方面去看。这样读了几遍，他把这书里重要的几个方面都摸透了。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④的方法。苏轼早年写的历史论文，如《鲁隐公论》、《管仲论》、《六国论》，和后来上书朝廷议论军事政治，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

① 李廌《师友谈记》：“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昔欧阳文忠尝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

② 苏轼《答谢民师书》比文章为“精金美玉”，《答刘沔书》比文章为“金玉珠贝”。

③ 引语见孙复《答张洎书》。

④ 参考苏轼《与王庠书》。

实及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见出他这方面的工夫。然而这仅仅是苏轼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苏轼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①。可是它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②的艺术特点。苏轼少年时在他父亲指导之下，曾多方面向古人学习。就议论文说，他受《战国策》、《孟子》、《庄子》的影响较深。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他少年时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接着写了三篇《中庸论》。《中庸论》在苏轼散文里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已经看出他散文风格上的某些特征，那就是说理的透辟与想象的丰富。后来苏轼到汴京应礼部试，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以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录取后他去谒见欧阳修，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他说：“何须出处？”^③这不但表现他丰富的想象能力，还见出他要求摆脱书史上的束缚，更自由、也更大胆地表达意象的创作精神。

远在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已经总括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形势，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到了北宋时期，经过历代学者的记录与整理，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经验更其丰富了。苏轼从小读书，就“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④。从他集中评议古人、史事、时政的论文看，他对于当时封建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和各个问题之间的错综变化关系是确有所见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对策的。他的《策断上》说：“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① 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② 何莲《春渚纪闻》引苏轼语。

③ 此据《老学庵笔记》。苏轼《上曾两制书》说：“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同样是出于“想当然”的。

④ 语见《苏轼上韩太尉书》。

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基于他对当时政治的这种认识，他对内主张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使“百官之众，四海之广”，“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①。这在精神上跟贾谊《治安策》要求“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一脉相通的。对外他不主张轻易用兵，但坚决反对避寇迁都的亡国作法^②。这种意见后来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他的议论的透辟性表现在善于从事物的辩证关系反复说明问题，如他的《王者不治夷狄论》，就反复说明“不治乃所以深治之”的道理，后来至成为优人打诨的笑料^③；在于力求文情显露，有时大段引述历史事实说明，使读者不必再去翻书就一目了然^④；在于善引浅近的比喻，增加文章的通俗性与生动性。他喜欢用治生、医病比喻治国。在他代滕甫写的《论西夏书》，拿“彭祖观井，自系大木，加之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来比喻用兵必出万全。虽近于笑话，却见出他的议论文的特点的。

苏轼晚年写的《答谢民师书》，说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一方面要求文章表达的自由，力求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一方面要求“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这里首先要求作家有广阔的学问基础与充

① 见苏轼《决壅蔽》。

② 见苏轼《平王论》。

③ 《诚斋诗话》：“东坡尝宴宾客，俳优者作伎万方，坡终不笑。一优突出，用棒痛打作伎者曰：‘内翰不笑，汝犹称良优乎？’对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盖优人用公《王者不治夷狄论》云‘非不治也，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按苏文中如《无责难》篇：“无责难者，将有所深责也。”《直不疑蒙诟以求名说》：“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类此尚多。

④ 如集中《续楚语论》引《楚语》屈到嗜芰一节，《始皇论中》引《史记·秦始皇本纪》，《与朱鄂州书》引《晋书·王湛传》，都就原文大段引述。

实的生活内容,如他说的“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花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①,虽然想不表现而不可得。其次是要求作家有高度的艺术修养,能“求物之妙”,并“能使是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②。由于苏轼能突破前人种种限制,要求在极大限度内自由表达他不能不表达的意境,这就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把韩、柳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发挥到了最高度,同时形成苏文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在他的书札杂文里表现得更其显著。

苏轼在凤翔时为他的朋友董传的丧事写信给韩琦求助,写董传的饥寒穷苦之状,他在黄州记他与张怀民在承天寺夜游的情景,都达到了“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的境界。他的特点是抓住了事物的特征,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跟他论画时所说的传神相通的^③。他在谪官时写给亲友的信,如在黄州《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他谪居时的心境,都那么亲切有味。他所揭示给读者的是作者所不能不表达的真情实感,而决不在语言文字上装腔作势。文章到了这个境界,不但摆脱了汉魏以来文家“以艰深文其浅陋”的作风,同时也避免了从韩愈以来古文家们“力去陈言夸末俗”^④的矜持习气。这不仅决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与修养,同时有关于当时社会文化的普遍高涨和这种文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更其广泛的应用。

① 见苏轼《江行唱和诗序》。

② 引语并见苏轼《答谢民师书》。

③ 参看苏轼《传神记》。

④ 韩愈《答李翊书》:“惟陈言之务去。”要求文章能避免陈言滥语,本是对的;但后来有些古文家却专在语言上追求新异,又形成了文学上一种偏向。王安石《韩子》诗:“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就是针对这种偏向而发的。

三

苏轼活动在十一世纪的后半个世纪，经历了从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当时中国的封建经济与社会文化在长期统一与安定的环境里正得到空前的发展；然而从另外一面看，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已在趋向分裂，国家的危机正在潜滋暗长。苏轼遗留下来的二千多首五七言诗，写出了诗人多方面的活动，也反映了北宋王朝由全盛而开始转向衰微的时代风貌。

苏轼在王安石执政时写了不少讽刺新政的诗，虽然也反映新法推行时一些流弊；然而由于他在政治上站在旧党的一边，没有看到新法对人民有利的也是主要的一面，甚至连农田水利、青苗等对广大农民有利的措施也加以无情的嘲笑^①。这显然没有收到象他自己所表白的“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②的政治效果。

苏轼诗歌的丰富内容主要在通过他所接触的生活面，反映了十一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经济与社会文化的高涨，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高涨时所暴露的危机，以及人们在这种社会现实里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在苏轼从事文艺活动与政治斗争将近半世纪的时间里，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许多重要州郡。他平生交接，上及欧阳修、梅尧臣、张先等老一辈的诗人与学者，下及陈无己、李格非等北宋末期的作家。除了这些学者文人之外，他还结识了一些画家、僧人、道士、医师、名妓等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用五七言诗体跟他们投赠唱和，写出了他们的为人，他们在政治、文学、艺术、哲理等各方面的见解和成就，也突现了诗人本身的声音笑貌

① 参看苏轼《山村五绝》第四首及《八月十五日观潮五绝》中第四首。

② 引语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以及他在学问上的独到见解与艺术上的卓绝才能。他的《凤翔八观》、《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子由论书》等篇，不但表现了作者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的特殊作风，同时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在北宋时期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苏轼一生在朝廷时候少，在四方流转时候多，他诗笔所触及的社会生活面比之他的前辈以及同时期的许多诗人都更为广阔。我们从他的诗歌里还看到了当时武昌农民用“朝分一垄暮千畦”的秧马来插秧^①；蜀中蚕市时，瓢轮、蚕箔堆积得象连山一样^②；彭城铁冶里已开始用石炭锻炼锋利无比的刀剑^③。他的诗笔也描画了江淮之间“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馀”的鱼蛮子^④；“照溪画眉渡溪去，逢郎樵归相媚妩”的於潜村女^⑤；“口吹葱叶送迎翁”的海南黎族儿童^⑥。诗人不论在睡起时看到窗前一片绿阴^⑦，泊舟古岸时听到一声“卖饼”^⑧，或闲居时听到邻家儿童的读书^⑨，都引起他的长谣短吟，表现他内心无比的喜悦，而这正是北宋经过百年承平岁月所给予诗人的真切感受。

他的一部分诗歌也表现了新旧党争时仕途的纷扰，他自己在政治上的孤危地位，人民在遇到灾荒时的凄惨景象。他的《许州西湖》诗，指摘地方官不顾连年饥荒，还为了春游发动民工开湖。《荔枝叹》诗讽刺那些为了巴结宫廷，要地方进贡佳果名花的大臣。而对于有些较为公正爱民却为上级所不容的官吏，如杜子方、陈琦、

① 见《秧马歌并引》。

② 见《和子由蚕市》诗。

③ 见《石炭并引》。

④ 见《鱼蛮子》诗。

⑤ 见《於潜女》诗。

⑥ 见《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中“总角黎家三小童”一首。

⑦ 见《溪阴堂》诗。

⑧ 见《慈湖峡阻风》中“此生归路愈茫然”一首。

⑨ 见《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诗。

王庆源等，苏轼却写诗对他们表示同情。他赠王庆源诗：“春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出色地描写了这个做了官还不失农民本色的人物。这一部分诗比较真实地反映北宋统治阶级在走向堕落，走向分裂，同时表现了作者在政治上的正义感。然而由于作者始终生活在全国统一、社会阶级矛盾还没有激化到爆发程度的北宋全盛时期，因此即在这些诗歌里也没有表现他对于时事的绝望心情。

“春畦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①。”“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②。”联想的敏锐是苏诗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诗人对于他生活中所接触的一切总是引起种种美好的憧憬。当他游博罗西山时看到山下的溪水，他跟同游者商量怎样利用水力来转动碓磨，于是更联想起水磨转动时象雪一样散落的面粉，联想起蒸饼熟透时裂开的十字纹与它所散发出的芳香^③。诗人在这些作品里流露的乐观精神，不但集中表现了我国人民对于和平生活的热爱，同时给读者一种“触处生春”的感觉，培养人们对于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与关心。

苏轼诗歌的乐观精神还表现在他能以一种傲兀的态度对待他在人生道路上所遭遇的困难与敌党对他的迫害。“平生傲忧患，久矣恬百怪^④。”正是他在这一方面的自白。他一面认为人生在衣食上应随缘自足；一面认为艰苦的环境足以锻炼人的志气。一面热爱祖国的山川风物，珍视亲朋师友之间的情谊；一面认识到仕途风波的险恶，留恋高官厚禄容易使人腐化堕落。这就使他能以“无人而不自得”的态度对待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风波与挫折。当他受到

① 引自《南园》诗。

② 引自《初到黄州》诗。

③ 见《游博罗香积寺》诗。

④ 引自《十月二日将至涡口五里所遇风留宿》诗。

一连串的打击被安置在一般中原人士认为“生还无望”的海南岛时，他还是丝毫没有改变豪迈的态度。他从琼州到儋州在山中遇到风雨时写了一首诗：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山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渺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音，不闻蓬莱宫。

诗人在北望中原，但见一片积水时虽也曾引起“穷途”“安归”的感慨；可是当他以超旷的态度摆脱现实对于他的束缚时，诗人思想的双翅顿即高举飞翔。他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的当前景象里联想起群仙的高宴，为他的北归有期而举酒庆贺；联想起群龙的向他催诗；而当他诗成时，“梦云”、“笑电”都为之“变色”“改容”，惊叹这样的好诗在仙宫都久矣不闻了。

我国唐代诗人如李、杜、韩、白诸家，虽风格各有不同，却同样具有丰富的内容与阔大的气象。在晚唐五代的分裂时期，诗体日见卑弱。北宋王朝统一中国以后，欧阳修、梅尧臣等作者才重新把五七言诗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苏轼继承了他们的道路，加以恢阔变化，使我国诗歌在十一世纪后期又涌现一个高峰。

比之特饶情韵的唐诗，宋诗往往以富于理趣见长，这在苏轼的诗篇如《泗川僧伽塔》、《题东林壁》等诗里，更容易得到印证。

苏轼诗在语言上善于铸造色泽鲜明的名词与短语，突出事物的特征；善于运用生动有力的动词，表现事物的动态。他的《望湖楼晚景》诗：“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和子由中秋见月》诗：“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大风留金山两日》诗：“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